

中国通史之 共和国史

前言

中国人民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历经一百余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从此结束了饱受压迫和侵略的屈辱史。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建立初的三年,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从 1953 年起,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还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正确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下来的十年中,中国为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江青集团。后来胜利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口号,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并且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作出了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且决定开始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共和国进入

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艰苦奋斗,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之后,又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其特点是 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 城市经济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

1997年 7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会议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重新确定了新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至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同时,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此外,在 1990年代,中国政府还解决了关于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两件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市场与计划的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方针,它解放了人的思想,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此,中国

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

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举国上下一片悲痛,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表达对领袖的崇敬和哀思。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都深切哀悼这位世纪伟人。

1997年 9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军队、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战略性部署。

1997年 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今天,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谱写出更绚丽的篇章,为世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民主建国 百废待兴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年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政府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民主改造,建立健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政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建立起来。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调整方面,稳定了金融物价,统一了全国的财政。在军事上,解放军继续追歼残敌,相继解放了西南、东南地区,除部分海岛外,全国解放。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中国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9年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确立了中苏同盟关系。为了清除旧社会的遗毒,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又开展了禁毒等运动。

1949 第一届人民政府成立

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共识:首先撤销华北人民政府,把这个班底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从其他地方抽一部分人来充实加强政务院的人事力量。

周恩来非常重视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认为,他们理应在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不仅在政务院系统中有大批民主人士任职,而且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也包括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

鉴于傅作义将军对北平和平解放之贡献及他个人的水利工作经验,周恩来又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曾多次拒绝旧中国政府的委任。1949年12月来到解放后的北平时他仍无意做官。1949年12月15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的要求。经过周恩来两个多小时的劝说,黄炎培被说服了。他终于答应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无独有偶,曾在旧社会拒绝反动政府高官厚禄的著名学者梁希,在1949年12月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农业部部长由李书城出任。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党内有过贡献。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在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担任要职。

1949年12月15日下午,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对几位政务院副总理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9个副总理,民主人士占了一半(即郭沫若和黄炎培)。10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了5人。政务院下属18个机构的182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多达122人,其中包括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

1949年10月1日,政务院人事安排好后,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各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从此,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一起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新政府各部门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经过短短的三年就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这标志着新中国的迅速崛起。

稳定物价

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时之间全国物价猛涨。对此,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稳定物价方面下了大功夫。

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致使国家财政枯竭,通货膨胀惊人。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前夕,上海的商品批发物价指数是战前的两百多万倍。恶性通货膨胀使投机活动十分猖獗,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所以,中财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稳定了物价,就稳定了人心,才有可能恢复秩序,恢复经济。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稳定上海,恢复上海的经济,对全中国各方面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解放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上海的物价就波动了两次。在华中,地处五省通衢的汉口,物价也剧烈波动。有些人拒绝使用人民币,情况极为严重。沪汉物价不稳定,使得各地人心难以

安定。中央于愿月初在上海召开会议,研究各大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货币发行问题,寻求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的办法。

上海会议开了五天,提出了种种有效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这就有力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财经工作。会议认为要从收税、公债发行和钞票发行入手来解决财经困难。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以下认识: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加之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多收一些税、多发行一点公债是不会有大的问题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量的需求也会增加。会议从当时的全局出发,作出了正确的指示:解决财经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支援战争的问题,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问题就会孤立起来,就经济论经济,路子不会宽广。

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这个原则出发,会议决定:各区共同努力来支持上海,承担分配的粮、棉调拨任务。上海生产的恢复是全国的开头,以后其他地区就好办了。从这时起,全国开始实行了粮、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

陈云向财经领导机关特别提出:中央财委要有思想和战略眼光。那时,各级财委机关正处在组建过程中。陈云强调财委要成为专门的管理与研究机构,并且党内外的有识之士要共同合作。后来,他多次强调过这个思想,要求财委多考虑研究经济工作的战略问题,成为通观全局的经济工作机构。

从中财委本身来说,当时建设队伍和设置机构就是按此想法进行的。

建国伊始,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民族资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受国家政权保护。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拥有政治资本,经济实力足以影响金融物价。他们自以为身价很高,看不起共产党,说共产党是一群‘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 强 国 分,政治 强 国 分,经济 弱 国 分’),又乘国家没有很好地控制市场的机会,开始扰乱市场秩序。所以,这场斗争也是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的斗争。这场斗争初战告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开始树立起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国家开始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使之各得其所。

金融市场上的银元斗争,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同党的初次较量。1949年春,国民党已趋于崩溃的边缘,南方一些新解放的城市在金融市场碰到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金元券已不打自倒)的问题,而是银元的问题。

上海刚解放时,新政府往市场投了少量的人民币,但大部分还浮在市面上,充当本位币的依然是银元,人民币根本无法买到成批的东西。银元投机现象于是也随之发生。

银元投机现象严重地冲击了金融市场,危害了正当的工商业,对市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银元投机如不禁止,就无法树立人民币的信用,金融也难以稳定。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以银元制服银元,即用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先集中

大量银元在市场上抛售,把价格压低,最后宣布禁止银元流通。这个方案试行后,没有起什么作用。后来,上海市决定组织一次严厉的政治打击活动。首先市政府把各阶层的骨干人士发动和组织起来,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同时于 1949 年 5 月 26 日关闭了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了严重违法的投机者。在政治打击的同时,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从此人民币代替银元,占领了金融市场。

继银元斗争之后的又一个回合是在粮食和纱布市场上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银元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资产阶级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部分人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还要伺机反扑。那时,由于物价不稳定,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成为囤积的对象。

较量的主战场仍然是上海。在中财委统一部署下,各地统一行动,实行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的方法,在抛售物资的同时,加紧收缩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在国家银行,不准贷款给私营企业和私营银行。这一抛(抛售的物资主要是纱布)一收(收紧银根),使资本家两面挨“耳光”,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

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的运费和粮价差不多,但仍按原价销售,这其中的差价全由国家补贴。这样做看似不符合经济原则,但从稳定上海,进而稳定全国经济以恢复生产这个大局看,这样做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完全必要的。

各地市场从 1949 年 5 月 26 日起趋向稳定,到 1949 年 6 月

月 15 日物价不再骤涨。以 1949 年 7 月底为基期,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四大城市的物价涨幅基本稳定在原来物价的 1 倍的水平上,基本上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物资力量和货币发行状况。

解放东南沿海与西南内陆

第四野战军及暂归其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南渡长江、推进湘中和赣南后,休整了一段时间,于 1949 年 8 月中旬起,先后又进行了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和广西战役,这几场战役歼灭了白崇禧、余汉谋两个集团,解放了湖南、广东(除海南岛外)、广西。

当时白崇禧集团据守在以衡阳、宝庆(现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凭借湘江、永乐江、资水天险,背靠云南、广西、贵州,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集团相衔)、西至湘西芷江的“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挡解放军南进的步伐。白崇禧将其兵力全部部署在此线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三个兵团均驻于衡阳。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全国战局的发展及敌人一触即退的特点出发,指出:“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应做好在湘南作战的准备。”同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我军方能掌握主动权,即以我为主,置白部的部署而不顾,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第四野战军由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统一指挥。他们遵从中央军委的指示,把兵力分为东、中、西三路军,

具体确定了行军和作战计划。

衡宝战役

1949年 12月 1日至 12月 15日，第四野战军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和白崇禧部展开激战。

12月 15日起，中、西路军相互配合，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的精锐部队四个师 15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地区。白崇禧余部绝大部分逃往广西。衡宝战役遂于 12月 15日结束。

广东战役

12月 15日至 12月 15日，在广东韶关至广州的铁路沿线及阳江、阳春地区，东路军又与敌军展开了一次激战。

东路军以 12月间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为依据，分三路南下，于 12月 15日向广东发起进攻。粤北守敌纷纷南逃，广州城于 12月 15日晚被解放。至 12月 15日，广东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 15万人，为随后进行的广西战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西战役

湖南、广东解放后，12月 15日至 12月 15日，广西战役又打响了。

白崇禧部退入广西后，到处抓丁补充军队，兵力上保持在 15万人左右，加上西逃的余汉谋部，共约 15万人，他们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防御。

第四野战军首长认为，广西作战的关键是采取大迂回动作，先切断敌人退往云南、雷州半岛及钦州的退路，再依情况调整兵力，歼灭敌人。据此，对西、中、南三路军的作战行动进

行了详细部署。

在精心部署下,南路军于 12月 10日在博白挫败白崇禧的“南线攻势”。与此同时,西、中路军也分别南下,追击南撤的敌军。已逃往海南岛的白崇禧不得不赶到钦州湾布置总撤退。

各军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于 12日将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以及第十、第十一兵团残部等围歼于钦州、小董圩地区。至此,解放军取得了彻底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胜利。至 13日,又占领镇南关(现友谊关),控制了中越边境。除逃入越南的残敌 1万人外,其余均被歼灭。广西战役歼敌 15万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实现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境内歼灭白崇禧的计划。

1950年 12月,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共 16个军约 15万人,还有许多保安部队和许多的杂牌武装在西南地区盘踞。蒋介石依靠这些残存兵力,想占据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同解放军“持久作战”。他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点,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西南防线”。

中国西南的地形十分复杂,到处是山地和连绵的丘陵,山陡路窄,交通不便,易守难攻。中央军委从西南的地理情况出发,结合国民党的企图,于 12月 14日指示:“欲消灭胡(宗南)军及川康诸敌,必须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12月 15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等,指出进军西南的方针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转至敌后,先完成包围,再杀个回马枪。”这一部署的意图是:通过多层次远距离的迂回,首先切断敌军逃往

西康、云南和国外的通道，再分别歼灭胡宗南集团于川、贵、云境内，不使敌人逃往国外，留下后患。

解放贵阳、重庆

1949年11月，进军西南的战斗打响了。第五兵团等部于11月3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11月5日遵义解放，敌人的西南防线被拦腰切断，对川境敌军向云南、贵州逃跑的退路构成巨大的威胁。第三兵团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突破敌川鄂边防线，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也被歼灭。

11月6日，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至11月10日切断了敌人逃往贵州、云南的主要退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逐渐感动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11月12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的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得以和平解放。蒋介石眼看‘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战略计划已经破灭，于11月14日连同‘国民政府’的要员坐飞机逃往台湾。

胡宗南全军覆没

在敌人向川西聚集的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迂回战仍是歼灭胡宗南集团最有效的方法，具体来说即让部队迅速占领乐山、蒲东、邛崃，截断敌人退往西康、云南的最后一条道路。

11月18日，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也被彻底歼灭。

1949年12月，由广西进入云南的二野四兵团及四野一部，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大部，仅第八军军长李弥率少数残敌逃出国境。云南全省解放。

猿月中旬至 源月初,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猿缘年 圆月 圆日成立)部队挺进川滇要冲西昌地区。胡宗南、贺国光兵败,仓皇飞逃台湾。至此,除昌都一隅外,云、贵、川、康四省均告解放。在进军西南的作战中,我军共歼敌 怨万人,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割据西南、待机反攻的计划,也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

漳厦战役

福州战役后,汤恩伯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及厦门分署主任,有残部 源万人,兵力相对集中,既有海峡天险作屏障,又具有相当强的防御能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担负向福建进军的任务。首长确定了首先歼灭漳州地区之敌,控制进攻金門、厦门的有利阵地,然后视情况而夺取厦门和金门的作战计划。

第十兵团于 怨月 猿日发起漳厦战役, 猿月 猿日解放厦门岛,歼灭敌军 圆万人,同时占领了鼓浪屿。

金門失利

厦门岛的解放,极大地威胁了金門守敌。敌军为加强该岛防御,将潮安、汕头地区的第十二兵团附属的两个师先后调至金門以加强此地的兵力,兵团的后续部队也在继续增援。

厦门解放后,第十兵团的精锐部队主要用于城市接管,而低估了金門的国民党军。 猿月 圆日夜,攻岛部队开始进攻金門,中途遭炮火拦击,船队失去航渡队形。登上岛后,各部各自进行攻击和穿插。这时,敌第十二兵团之第十八军已到达该岛加入战斗,协同原有守军,在坦克、炮兵的配合下对解放军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解放军所乘船只全部搁浅,被敌

人飞机及地面炮弹全部炸毁。失去后续部队的增援,登岛部队陷入困境。激战至 10月10日,两批登陆部队共 1.2万人 (内有船工、民夫等 1.2万人),大部分英勇牺牲,一部分被俘。金门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遭受的一次重创。

解放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是中国海上航运要冲,是江浙两省和上海市的屏障,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舟山守敌控制群岛,封锁海面,保护台湾安全,干扰大陆经济,必须剿灭。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他们采取逐岛攻击,先取外围,后攻本岛的策略。至 10月10日,第七兵团共攻占舟山外围岛屿 10余个,近万敌人被歼,从而为夺取定海本岛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军增援舟山,使守军人数达到 1.2万余人,防卫力量大大增强。根据这一情况,第三野战军的参战兵力由 1.2万人增加到 1.2万人,另外还有 1.2个炮兵团,总兵力已占有很大优势。准备参加战斗的还有刚组建的海、空军各一部。

1949年 10月,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的情况,又得知第三野战军将对舟山群岛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消息,为了保存实力,便把一切兵力集中起来保护台湾,命令舟山群岛守军秘密撤退。10月10日,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对长江口的封锁,为保卫海防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有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的 1.2个军,加上主要用于环岛巡逻和海上封锁的海、空军,总兵力约 1.2万人。

敌人企图以所谓的‘立体防御’凭险固守，把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的一个跳板，同时，他们准备在不利情况下后退。

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集结 苑余万兵力于雷州半岛，积极进行渡海准备。毛泽东指示四野吸取金门作战失利之教训，加强渡海作战训练与组织准备工作。

源月 苑日，渡海作战兵团首长下定决心，以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强渡。源月 苑日晚 苑时，东西两路军并肩从雷州半岛南端强渡琼州海峡。源月 苑日，我军在海口市以西登陆，源月 源日，第二梯队在天尾港登陆，两路对敌猛攻。至 源月 猿日榆林、三亚解放，缘月 员日，占领人所、北黎，至此，海南岛全境解放。

海南岛的解放，意味着拔掉了国民党在海南的主要基地，对于捍卫祖国领土，保卫神圣海疆，保障祖国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

瀛中苏同盟建立

苑缘年 苑月 远日，毛泽东登上赴苏联的专列，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出国访问活动。

苑缘年 苑月 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苑月 圆日，苏联政府来电表示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立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全权大使。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两国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